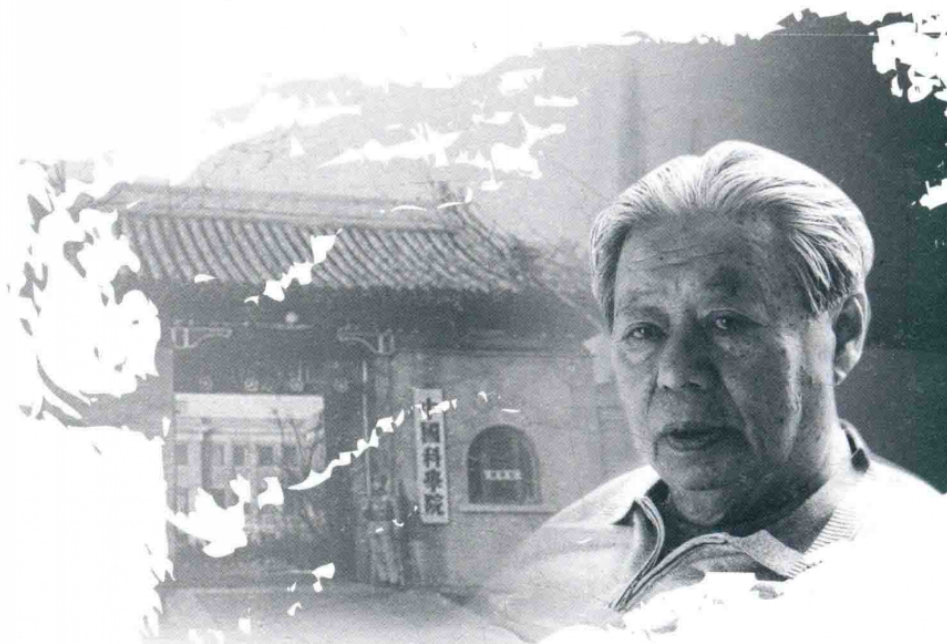




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 THE ORAL HISTORY OF SCIENCE IN 20TH CENTURY CHINA SERIES



科技政策研究 三十年 ——吴明瑜口述自传

30 YEARS' RESEARCH ON POLIC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ORAL AUTOBIOGRAPHY OF WU MINGYU

吴明瑜◎口述 杨小林◎访问整理

CS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

湖南教育出版社

科技政策研究 三十年

——吴明瑜口述自传

30 YEARS' RESEARCH ON POLIC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ORAL AUTOBIOGRAPHY OF WU MINGYU

吴明瑜◎口述 杨小林◎访问整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技政策研究三十年：吴明瑜口述自传 / 吴明瑜口述；
杨小林访问整理.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5. 12
(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 / 樊洪业主编)
ISBN 978-7-5539-3465-5

I. ①科… II. ①吴… ②杨… III. ①吴明瑜-自传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5322 号

-
- | | |
|------|---|
| 书 名 | 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 科技政策研究三十年——吴明瑜口述自传 Keji Zhengce Yanjiu Sanshi Nian——Wu Mingyu Koushu Zizhuan |
| 作 者 | 吴明瑜口述 杨小林访问整理 |
| 责任编辑 | 王雯雯 |
| 责任校对 | 鲍艳玲 |
| 出版发行 |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 |
| 网 址 | http://www.hnepb.com |
| 电子邮箱 | hnjycbs@sina.com |
| 客 服 | 电话 0731-85486979 |
| 经 销 | 湖南省新华书店 |
| 印 刷 |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10×1000 16开 |
| 印 张 | 18 |
| 字 数 | 240 000 |
| 版 次 | 2015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539-3465-5 |
| 定 价 | 48.00元 |
-



《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编委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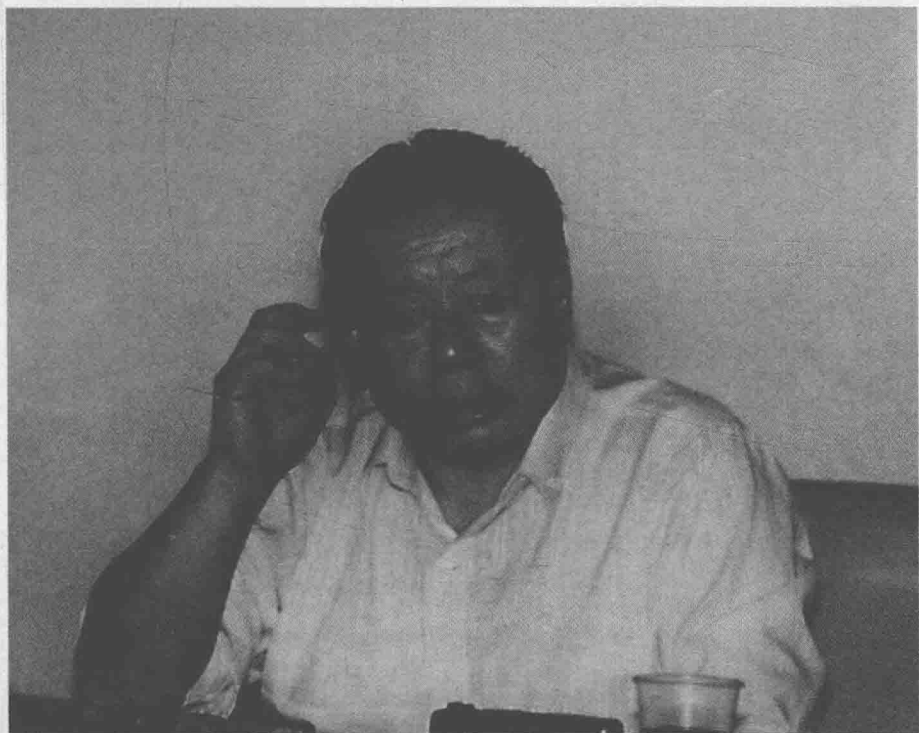
主 编：樊洪业

副主编：王扬宗 刘新民

编 委（按音序）：

樊洪业 李小娜 刘新民 王扬宗 熊卫民

杨 舰 杨虚杰 张大庆 张 藜



1996年5月23日吴明瑜先生在“纪念《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40周年座谈会”上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人生导师
张劲夫 杜润生 胡耀邦 方毅

科技政策研究三十年

——吴明瑜口述自传

30 Years' Research on Polic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Oral Autobiography of Wu Mingyu

主编的话

以挖掘和抢救史料为急务

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经过宗教改革、世界地理大发现、科学革命和产业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市场和近代文明。在此过程中，科学技术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最强大的动力，其影响至 20 世纪最为显著。

在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中，国人知识结构的质变，第一代科学家群体的登台，与世界接轨的科学体制的建立，现代科学技术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乃至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一系列重大科技成就的取得，都发生在 20 世纪。自 1895 年严复喊出“西学格致救亡”，至 199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确定“科教兴国”的国策，百年中国，这“科学”是与“国运”紧密关联着的。百年中国的科学，也就有太多太多的行进轨迹需要梳理，有太多太多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

关于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可能是格于专业背景方面的条件，治通史的学者较少关注科学事业的发展，专习 20 世纪科学史者起步较晚，尚未形成气候。无论精治通史的大家学者，或是研习专史的散兵游勇，都共同面临着一个难题——史料的缺乏。



史料，是治史的基础。根据 20 世纪中国科学史研究的特点，搜集新史料的工作主要涉及文字记载、亲历记忆、图像资料 and 实物遗存这四个方面。

20 世纪对于我们，望其首已遥不可及，抚其尾则相去未远。亲身经历过这个世纪科学事业发展且作出过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和领导干部，大都已是高龄。以 80 岁左右的老人为例，他们在少年时代亲历抗日战争，大学毕业于共和国诞生之初，而国家科学事业发展的黄金十年时期（1956—1966）则正是他们施展才华、奉献青春、燃烧激情的岁月。这些留存在记忆中的历史，对报刊、档案等文字记载类史料而言，不仅可以大大填补其缺失，增加其佐证，纠正其讹误，而且还可以展示为当年文字所不能记述或难以记述的时代忌讳、人际关系和个人的心路历程。科学研究过程中的失败挫折和灵感顿悟，学术交流中的辩论和启迪，社会环境中非科学因素的激励和干扰，等等，许多为论文报告所难以言道者，当事人的记忆却有助于我们还原历史的全景。

湖南教育出版社欲以承担挖掘和抢救亲历记忆类史料为己任，于 2006 年启动了《20 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的工作计划，在学界前辈和同道的支持下，成立了丛书编委会，于科学史界和科学记者群中招兵买马，认真探索采访整理工作规范和成书体例。通过多方精诚合作，在近两年中已出版图书 20 种，得到了学术界和读者的认可。

近年兴起的口述史（Oral History）热潮，强调采访者的责任，强调采访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互动，强调留下“有声音的历史”。不过，口述史内容的“核心”是“被提取和保存的记忆”（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把记忆于头脑中的信息提取出来，方法上有口述与笔述之差别，但就获取的内容

而言，并无实质性的差别。因此，本丛书当前在积极组织从事口述史采访队伍的同时，也积极动员资深科学家撰写回忆文本，作为“笔述系列”纳入到本丛书之中来。

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事业，除科学研究之外，还包括科学教育、科学组织、科学管理、科学出版、科学普及等各个领域，与此相关的人物和专题皆可列入选题。

本丛书根据迄今践行的实际情况，在大致统一编辑规范的基础上，将书稿划分为5种体例：

1. 口述自传——以第一人称主述，由访问者协助整理。
2. 人物访谈录——以问答对话方式成文。
3. 自述——由亲历者笔述成文。
4. 专题访谈录——以重大事件、成果、学科、机构等为主题，做群体访谈。
5. 旧籍整理——选择符合本丛书宗旨的国内外已有文本重新编译出版。

形式服务于内容，还可视实际需要而增加其他体例。

受访者与访问整理者，同为口述史成品的作者。忆述内容应以亲历者的科学生涯和有关活动为主线展开，强调以人带史，以事系史，忆述那些自己亲历亲闻的重要人物、机构和事件，努力挖掘科学事业发展历程中的鲜活细节。

书中开辟“背景资料”栏，列入相关文献，尤其注重未经披露的史料，同时还要求受访者提供有历史价值的图片。这些既是为了有助于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忆述正文的内容，也是为了使全书尽可能地发挥“富集”史料的作用。

有必要指出，每个人都会受到学识、修养、经验、环境的局限，尤其是人生老来在记忆力方面的变化，这些会影响到对史实忆述的客观性，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口述史的重要价值。书



籍、报刊、档案、日记、信函、照片，任何一类史料都有它们各自的局限性。参与口述史工作的受访者和访问者，即便是能百分之百做到“实事求是”，也不能保证因此而成就一部完整的信史。按名家唐德刚先生在《文学与口述历史》一文中的说法，口述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的历史，而是口述史料”。史学研究自有其学术规范，不仅要用各种史料相互参证，而且面对每种史料都要经历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本丛书捧给大家看的，都是可供研究 20 世纪中国科学史的史料，囿限于斯，珍贵亦于斯。

受访者口述中出现的历史争议，如果不能在访谈过程中得以澄清或解决，可由访问者视需要而酌情加以必要的注释和说明。若对某些重要史实有不同的说法，则尽可能存异，不强求统一，并可酌情做必要的说明或考证。因此，读者不必视为定论，可以质疑、辨伪和提出新的史料证据。

本丛书将认真遵循求真原则和史学规范，以挖掘和抢救史料为急务，搜求各种亲历回忆类史料，推动 20 世纪中国科学史的研究！

欢迎各界朋友供稿或提供组稿线索，诚望识者的批评指教。谨以此序告白于 20 世纪中国科学史的研究者和爱好者。

樊洪业

2011 年元月于中关村

科技政策研究三十年

——吴明瑜口述自传

Research on Polic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Oral Autobiography of Wu Mingyu

吴明瑜序

回顾我这一生的工作经历，大部分时间与科技政策密切相关。

关于对科技政策的理解，我个人的看法，曾在一本书里表述过^①，就是指在一个国家内，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路线和国家建设任务，在科学技术领域内采取的行动和规定的行动准则。它既是国家总政策的组成部分，又是确定科技发展方向、指导整个科技事业的战略和策略原则；它既包括全局性的科技发展战略，即科技发展总目标、总任务，也包括局部的、临时性的策略，如各部门、各地区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所确定的为完成战略目标的各项具体的实施方针和策略原则。

新中国成立 65 年来，科技事业的发展可以分为若干个发展阶段，我有幸在 1956—1986 年这三十年中，参与了一系列重要科技政策的起草与制定工作。

这三十年，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很凑巧，每个阶段都是大约十年。下面简要梳理一下我个人亲历的这几个历史阶段科技政策研究的时代背景。

① 吴明瑜主编，科研管理工作手册，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6。



黄金岁月（1956—1966）

我是 1956 年 2 月到中国科学院工作的，当时党中央刚刚召开过知识分子问题的工作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了两个核心问题，也是两个相联系的问题。一个是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政策问题。他根据大量的调查材料，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充分肯定了他们在政治上、业务上的巨大进步及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大作用。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他们是依靠自己的工薪来生活的。第二个就是中央决定要制定《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即“12 年规划”。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也号召全体共产党人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发布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提出要“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这个动员令掀起了全国人民办科学的热潮，广大知识分子以蓬勃的热情和朝气投入了新中国的科技建设。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结束之后，1956 年 1 月 31 日国务院召开了制定 1956—1967 年科学规划的动员大会，到 1956 年 7 月中旬规划编制工作结束，经过几个月的研究、讨论、汇总，从 13 个领域提出了 57 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这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创造性工程。它所采用的“方法论”也指导了以后几十年科技规划的制定工作。

为了更好地实施“12 年规划”，按照周恩来总理的要求，科学规划委员会又提出了《发展计算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

电电子学、自动学和远距离操纵技术的紧急措施方案》（即“四大紧急措施”）。

“12年规划”制定后经过将近10年的发展，中国的科学事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成就斐然。

这期间出现的“反右派”斗争和“大跃进”严重挫伤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科研秩序。1961年，在科技界“总司令”聂荣臻的领导和支持下，由中国科学院首先带头调整一些重要政策，整顿秩序，起草和制定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简称《十四条》。聂总亲自督促民口和军口科技系统坚决地、彻底地贯彻《十四条》的各项规定，使科研秩序重新恢复，科研工作得以较为正常地进行。从1956年到1966年的十年间，真正能够心情愉悦、思想活跃地开展科研工作的时间还不到三四年。但这十年间我们的科学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所以人们至今还怀念这个十年。

十年浩劫与“百日维新”（1966—1976）

邓小平同志曾经讲过，“文化大革命”中，科学教育是“重灾区”。以科学院为例，十年中，全院被迫害致死的229人，其中高级科技人员27人。大批科研机构被解散，中国科学院大批研究所或裁并，或下放，或移交别的部门，最低时只剩下了13个直属研究所（1966年初为106个），大批优秀的中青年科技人员流失了。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提出了“安定团结”、“整顿工作”，借以纠“左”治乱。中央派胡耀邦到科学院主持工作，开始了科学院也是科技界的“百日维新”。耀邦同志深入北京地区各研究所，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向中央、国务院提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然而事



不由人，突然发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又来了。

在“文革”的一通混乱之中，幸而有周恩来和聂荣臻的悉心保护和鼎力支持，从事国防现代化有关的科研机构与研究人员才得以按计划完成“两弹一星”和其他如核潜艇等国防重大科研任务，保障了国家安全的需要，也得到了世界的赞誉，真是不幸中的幸事。

从召开“科教座谈会”到迎接“新技术革命”（1977—1986）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当重新进入国际社会时，我们发现世界上的科学技术已经大大地突飞猛进了，我们又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1977年邓小平复出，采取了许多措施，在科教战线上“拨乱反正”，恢复科研秩序，重建队伍。1977年8月8日，科教座谈会召开，这是邓小平出来抓科教工作的第一个会。这个会议主要解决两大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恢复高考，这关系到千千万万个家庭，关系到几千万知识青年，大家觉得看到了新的出路，看到了国家新的希望。当今中国从部长到总理这一层领导人里面大都是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出来的人，现在成了国家的栋梁。再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小平同志提出的知识分子是劳动者，和工人农民分工不同。从根本上否定了毛泽东的“两个估计”的错误评价。

1978年3月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在那个年代里，这些简练的话语给整个知识界、整个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技工作出现了一派蓬勃生机。

这个阶段除了国家恢复高考、科学院恢复研究生制度、恢

复学位学衔制度之外，同时还开始加强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向外国大量派遣研究生等等。

这一时期的作为，并非简单的回归，还做了一系列建国30年来没有做到的新事情。1983年，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层特别关注世界产业革命的大趋势，深刻地分析了当代科学技术对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对认真迎接世界新的产业革命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及我们应当采取的对策进行了讨论，并做了各种形式的社会动员，又一次激起了科技工作者、各级干部以及广大青年向现代科学技术革命进军的热情。

与此同时，国家科委、计委、经委邀集科技专家和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先后拟订了农业、消费品工业、通信、机械、交通运输、城市建设和住宅建设、建筑材料、计算技术、半导体、材料工业等十几个国民经济重大产业的技术政策。

1984年10月，中央做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3月又做出了《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同志特别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两个决定，都是为了了解放生产力。这些决定改变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模式，肯定了市场化的改革取向。《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按照不同科研工作类型，实施不同的经费拨划制度，激励和推动技术开发型研究机构，密切关注市场需求，加强同企业生产的相互结合。

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科学家写信给邓小平同志，针对美国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和欧洲的“尤里卡计划”，建议制定新的规划，以应对迅速发展的高技术。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国务院指定国家科委组织科技专家们制订了“863”计划。邓小平为此专门做出了一系列指示，提出了“在高技术领域也要占一席之地”、“发展高技



术，实现产业化”、“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等重要方针。决定中还提出了要建立国家级的自然科学基金会，以保障和大力支持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

1980年代，我国制定了一系列重大的产业技术政策，把引进和自己研究开发结合起来，实现了多个领域的跳跃式发展。比如通信领域，80年代初，全国只有600万门纵横制电话，到90年代，我国整个通信事业出现了跨越式的大发展，再加之后来兴起的手机通信，今天的中国已有程控电话3亿多台，手机接近4亿部。这样巨大的变化真是过去做梦也未曾想到的！

当今世界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已经成为创造财富、创造新的社会生产力的最重要源泉。世界上的新技术新成就琳琅满目、日新月异，新产业层出不穷，这真正体现了知识的力量。在这重要时刻，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科技工作者和全国人民及时地提出积极发展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这是又一个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历史性的战略决策。

这个决策是顺应世界潮流的，也是切合我国实际的。我们可以预期，只要我们深刻地总结历史经验，把握机遇，采取恰当的政策和措施，那么经过十年二十年的脚踏实地、坚韧不拔的奋斗，我们必将迎来又一个新的历史性的飞跃：中国必将作为“创新型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现代科学技术就像一个大的殿堂，我们第一个飞跃只是踏进门槛，踏进现代化这个门槛，虽然经历了十年浩劫的破坏，但是我们毕竟踏进门槛了。第二个飞跃，是我们还徜徉于庭院之中，什么时候登堂入室呢？我们期待着。

在我与科技政策结缘的人生历程中，在不同的阶段，我先后跟随了老一辈革命家张劲夫、杜润生、胡耀邦和方毅，他们是我的领导，更是我的恩师。每个人的一生中，在离开校门走进社会的职场中，注定要遇到很多领导，但不见得能遇到几位真正称得上“恩师”的人。我很幸运，遇到了，我对他们感恩终身。写在书中的往事回忆，也是对他们的感念，向他们的汇报。

承蒙湖南教育出版社和丛书编委会的雅意，把“科技政策史”纳入到“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的范围，命我做一系统回忆，以存史资世。据告，限于丛书体例，访谈者要对自己的家世和求学经历有所介绍，而这于我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我过去并没有留意保存这方面的资料，自己也不觉得有什么好说，只能是简单从事复命了。

蒙杨小林同志热心协助，无论寒暑风雨，不厌其烦地做了多次访谈录音整理，在我时间精力不及之外，又广搜穷索各种文字图片资料，终可成书，一定要在此表达对她的感谢。

人的记忆，未见得全都可靠和准确，有记误或失敬之处，尚望各方人士批评指正。

吴明瑜

2015年4月